

以学派观看待杜威中国学生：中国杜威派学人思想及其影响

王颖

(北京理工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20世纪上叶,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学人在研究践行杜威教育思想过程中形成了中国杜威派。文章在研究杜威经验主义教育思想核心基础上,探讨了杜威派学人的师承关系及他们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揭示了中国杜威派学人对我国现代教育发展的意义。

关键词: 杜威; 杜威派学人; 经验主义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08)01-0087-05

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杜威学说一时成为教育家趋之若鹜研究的时尚学说和推进教育改革试验的指导思想,而另一时期又成为重点批判的靶子,让人避之惟恐不及,但无论是大起还是大落,杜威学说都不失为关注和研究的热点。杜威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上,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亲自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生,这些人中包括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郑晓沧、李建勋、张伯苓等闻名海内外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们回国后,掀起了以此为基础的教改浪潮,同时他们还充当了杜威思想的实践者,在教育领域尝试躬行。当今一些重点关注的教育问题,像如何实现学校与社会生活的结合,如何培养探究能力等,那时几乎都热烈地讨论过。因此,追根溯源,研究杜威及其中国学人的思想传承是有意义的。而将这样一大批中国近现代出类拔萃的教育家思想家归到一个美国学派名下,学界目前还有疑虑,首先很多人觉得在民族情感上接受不了;其次这些人的政治倾向大相径庭,将其混为一谈感到不习惯。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教育思想发展的轨迹及从事教育实践活动也各有特色,能否归到一个流派之中?这些都需要我们探讨。

从史学史上看,“学派”一词的产生基本上是近代西方的事情,现代意义的史学学派的形成也是较近的事,但是学派的研究却并不是最近发生,也并不存在西方。学派的研究与学派的产生并不同步,在学派一词出现前,史学界已有学派研究之实如《明儒学案》。《明儒学案》采取“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对明代理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做了总结,“一本”列出每个学派的相同观点、核心思想,“万殊”列出每个学

者的发展之处。因此,论述学派成立时,共同的师承渊源是体现学派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学术上的继承和发展则是关键。从师承及思想发展脉络看,20世纪20年代的杜威中国学生已然形成了实际的学派,在中国教育领域中发挥着极大影响。

一、中国杜威派学人学术渊源

20世纪上叶杜威思想在世界各地流行,他的中国弟子传承了杜威学派的一个分支,我们这里称为的中国杜威派,我们在论述中国杜威派学人时,必以杜威思想为起点进行论述。这里容易引起歧义的是杜威是美国的学者,中国杜威派学人皆属中国人,将他们归为杜威学派似有不妥。实际上,学派的划分是以地域、人名为主,正如《明儒学案》将各个研究阳明之学的学者归为本地的王门学派一样,我们也可将杜威、中国两术语冠至我们的研究对象上。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陈鹤琴、张伯苓、郑晓沧、李建勋等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学习,改造中国教育的共同的努力目标、共同的学习经历使这一学派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就已显现雏形,回国后他们继续拥戴杜威思想,并指导自己的研究实践,形成了中国杜威派学人群体。鉴于个案典型性,我们以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为主要研究对象,论证中国杜威派的成立。

胡适于1910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学习,他一向乐于承认自己是杜威的学生,是实验主义的忠实信徒。他曾在《胡适文选》中介绍自己的思想,“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

收稿日期:2007-07-10

作者简介:王颖(1969—),女,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外教育历史与文化、教育社会学。E-mail:mbedubnu@hotmail.com

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结论的假设”^{[1]658}。蔡元培曾说胡适之于杜威,“不但临时的介绍如此尽力,而且他平日关于哲学的著作,差不多全用杜威的方法”^{[2]286}。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也一直受杜威指导,回国后又对杜威思想进行了践行和发展,费正清曾评价说“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3]397}。陶行知 20 世纪 40 年代初在给杜威的信中自称“受业弟子”^{[4]934},也显示了他与杜威之间的学术渊源。郭秉文是最早接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学者,他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他的学生吴俊升曾提出“公为杜氏及门弟子,杜氏赴华讲学,公实促成,而杜氏教育学说之影响于中国教育至钜,公有倡导传播之功”^{[5]202}。郭秉文回南高师后,十分注意聘请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来校任教,并在东南大学校内实施杜威思想。蒋梦麟也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跟随杜威学习,他自述“我在哥大遇到许多诲人不倦的教授,我从他们得到许多启示,他们的教导更使我终生铭感。我想在这里特别提一笔其中一位后来与北京大学发生密切关系的教授,他就是约翰·杜威博士(Dr. John Dewey 1859~1952)。他是胡适博士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业师,后来又曾在北京大学担任过两年的客座教授”^{[6]92}。蒋梦麟在哥伦比亚大学与胡适一道师从杜威修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与胡适、郭秉文、陶行知一道邀请杜威来华讲学,任北大校长及教育部长时还在高等教育领域内推广杜威思想。张伯苓与陈鹤琴以及李建勋也同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哲学班学习,杜威、克伯屈等都曾指导过他们的研究。

从师承关系看,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陈鹤琴等与杜威存在着师生渊源,已具备了学派成立的基本条件,他们回国后研究、实践杜威实验主义教育思想,则使这一学派有了共同的宗旨,目标。

二、中国杜威派学人学术宗旨

杜威是思想家、哲学家,教育是他的最着力处,他曾在《民主主义与教育》、《经验与教育》中,详细阐述了他的经验主义教育思想体系,概括地说即新

“三中心”理论:一是以经验为中心,“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7]250},“经验就是生活”,因此“教育即生活”。二是以活动为中心,也就是从“做中学”,学校教育应从学生的经验活动出发,在游戏与工作中采用与学生和青少年在校外从事的活动类似的形式,使学生通过“做中学”,得到真正的生活教育^{[8]31-32}。三是以儿童为中心,现代教育要进行重心的转移,使儿童变成太阳,教育的一切措施围绕着他们转动^{[9]44}。杜威新“三中心”论是对传统教育“三中心”的反对,围绕着新“三中心”论,中国杜威派学人对杜威经验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发展。

1. 注重教育与生活之联系

胡适作为被公认的接受和实践杜威社会和政治学说的第一人,在教育上提倡教育与生活相联系。他曾尖锐地批评学校教育与社会需要严重脱节的现象,认为这种教育是亡国的教育,教育必须与社会实际生活相联系,使学生养成处理社会生活环境的能力^{[9]597}。在领导制定 1922 年新学制时,胡适等将“注重生活教育”列为“七项标准”之一,强调教育与生活一致性。蒋梦麟注意用杜威“生活教育”理论去观察和分析中国教育的实际问题,他以历史教学为例,指出教授历史应当以学生生活需要为主体,以平民生活为中心,注重历史与生活的有机结合,并以解决当前问题为要旨^{[10]8-11}。在中国杜威派学人中,对杜威生活教育理论实践阐述最多、最具创造性的一位是陶行知,他的生活教育理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晓庄师范学校的实践基础上,结合中国广大农村、中国社会实情,对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思想做了突破性的发展,并为现今教育重视联系生活做了理论实践铺垫。陈鹤琴提出“活教育”理论——强调课程要以社会生活为中心,以儿童活动为中心,学校要将大自然、大社会作为活教材,对儿童进行综合教育。张伯苓也认同杜威生活教育理论观点,指出“吾国学生之最大缺点,即平日除获得书本上知识外,鲜谙社会真正情状”^{[11]39}。他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生活,将所学与所用结合,实现校内外教育与生活实际的结合。

2. 强调学生个性教育

杜威在其论著中,多次批评不顾儿童个性发展

的旧教育,胡适继承这一思想,在领导制定1922年新学制时,将“注意个性之发展”列为学制制定“七项标准”之一,强调教育要以儿童为中心,学制系统宜顾及其个性及智能^{[12]75},为发展个性教育,他还主张在学校采用选科制和学分制,对不同的学生施以不同教育。在教学方式上,强调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要求教师不要总做系统讲解,代替学生的思考。相对于胡适重视个性的指导思想,陶行知提出了具体的对儿童实施的“五个解放”,解放小孩子的头脑、双手、嘴、空间、时间;尊重儿童的人权。另外,教师对于儿童“要同园丁一样,首先要认识他们,发现他们的特点,而予以适宜之肥料、水分、太阳光,并须除害虫”^{[13]523}。陈鹤琴也指出儿童有不同的个性,“活教育”要根据儿童生活的需要及儿童的学习兴趣,组织儿童活动场所。他还认为在学生违反学校规则,对学生进行教育时,也要考虑到儿童的个性特点,“在可能范围内须尽力顾全名誉,”还“须鼓励儿童勇于改过引起他们的自爱”^{[14]156-157}。郭秉文在大学教育中重视个性培养,他曾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兼顾个性发展的教育方针,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特长自由选择学习科目或有一定限制地选课。蒋梦麟也高扬个性教育,认为现代社会是由个人结合之社会,“其基础在强健个人”^{[19]37-38}。

3. 注重“做中学”

“做中学”是杜威根据当时社会不尊重儿童,学校教育没有儿童提出的观点。陶行知回国看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15]41-42},就认定中国学校一定要改革教学法。随即他参照杜威“做中学”,提出以教学法来代替国内的教授法,主张在教师和学生中创造一个更少被动的,相互学习的环境;之后在1922年新学制制定过程中,他提出独特的“教学做合一”理论,指出“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15]42},陶行知强调“做”的突出地位,显然来源于杜威的“做中学”,而又加以改造。

与陶行知相类似,陈鹤琴反对读死书,死读书,主张发展儿童的创造性和动手的能力,他在借鉴、吸收杜威学说基础上,提出“活教育”理论,强调儿童要“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张伯苓在“做中学”上也有自己独到的观点,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即是从张伯苓处受启发而来。张伯苓自己的观点为“学行合一”,“‘教学生行’。‘行’些什么?简言之,就是行做人之道。这样,才能算是好的教育”^{[16]159}。

中国杜威派学人在思想、实践中,都对杜威经验主义教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吸收、扬弃,在这一过程

中,他们也显现了各自的特点:

(1) 胡适与杜威经验主义

中国杜威教育学派中,胡适是“中国最著名的杜威思想的宣传推广者”^{[17]48-49},他确定经验、实验主义一词在中国的使用,并对杜威教育的含义、经验的含义进行了经典性的解释。他指出,“教育即是继续不断的重新组织经验”。怎么讲呢?经验即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人生四围的境地;即是改变所接触的事物,使有害的变为无害的,使无害的变为有益的。……懂得经验的意义,能安排某种原因发生某种效果,这便是说我们可以推知未来,可以预先筹备怎样得到良好的结果,怎样免去不良的结果。这就是加添我们主持后来经验的能力了^{[18]36-37}。经过胡适的通俗化解释,杜威的“经验”成为与生活相同的含义。改造社会,改造生活,便是增添经验,便是进行教育,这一解释奠定了教育界看待杜威生活教育观的基础。

(2) 陶行知与杜威生活教育

陶行知对于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都有实践,并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的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生活即教育”与“教育即生活”虽然表面只是词序的变化,但其意义却更广泛。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是解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及教育后专门的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脱离的问题,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将广大的中国乡村现实生活看作是教育的内容、广大的人民看作是教育的对象,生活与教育是一回事,它解决的是人民大众在乡村生活实践中接受教育问题。与“生活即教育”相连的是“社会即学校”,“社会即学校”是将广大的社会看作是教育活动的场所,这样一种教育观突破了狭隘的学校教育的限制,为当时中国农村教育提供了广阔的背景,使农民大众接受教育成为可能。为实现“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陶行知提出“教学做合一”方法论,并指出:“社会实践是什么,教学做合一就是什么”^{[19]668},这与让儿童从事模仿现实的游戏、手工活动的“做中学”相比是一种继承、创新。可以说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一种在社会、在生活中进行的教育,社会有多大,生活有多广,教育就有多少,这与杜威重视学校教育系统内的生活教育有着本质不同。

(3) 郭秉文、蒋梦麟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践行

中国杜威派学人中,郭秉文、蒋梦麟是致力于将杜威教育思想应用到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实践者。

郭秉文作为杜威的学生,曾邀请杜威来南高师做报告;管理东大时,延揽师资,崇尚实学,通过各种

途径寻觅学有所长的名家学者;并将成立于美国、由数百名中国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迁来南高,使之成为南高、东大师资来源的主要渠道。同时他还倡导民主治学,通过“三会制”将教授治校放到重要位置,并在学生中实施“自动主义”,使东南大学成为实施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阵地。

蒋梦麟任校长时,提倡注重自动,自治与训育,形成良好的民主素养,使个人健全活泼^{[9]52}。他曾与胡适拟定了振兴北大的计划,制定出“校长治校,教授教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方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教授们有充足的时间研究,学生也集中精力学习。在任教育部长期间,蒋梦麟厉行改革,确立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基本体制。

中国杜威派学人中,胡适主观上完全遵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努力使中国教育走杜威式西化之路。郭秉文、蒋梦麟也赞同杜威基本思想,并将杜威思想应用到高等教育领域中,对杜威教育理论进行的是中国化工作。陶行知则在对杜威生活教育思想进行实践时,冲出了杜威理论的樊篱,对杜威的思想作了极端的修正。无论怎样,这些学人的基本思想都与杜威有着紧密的相关性。

三、中国杜威派学人对我国教育的影响

中国杜威派从形成、发展至衰落,前后仅是二三十年的事情。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杜威派学人秉持实用主义服务现实生活思想,进行了理论实践思考,推动了中国教育的发展。

在中国教育开始全面改革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教育部长、教育厅长、大学校长很多由杜威派学人担任。蒋梦麟曾任教育部长和北大校长,在教育部长期间,他制定并颁布了《大学组织法》,为中国高等教育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任北大校长时他又为北大迈向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胡适曾任北大教务长、校长和中国公学校长,积极提倡北大用全力钻研高等学问与高等学术。郭秉文在南京高师以及国立东南大学进行教育改革,经由他的努力,东南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同时为中国近代理工科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陈鹤琴曾任北高师校长,张伯苓任南开大学校长,陶行知任南高师教育系主任,这些中国杜威派学人身居中国教育的高位,在大学实施经验主义教育,改革传统教育,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在普及教育、大众教育方面,中国杜威派学人也是卓有成效,从最初的胡适、蒋梦麟、陶行知推广的平民教育,一直到后来陶行知开展的生活教育、

陈鹤琴开展的“活教育”,都在为中国的大众教育、普及教育而奋斗。在杜威来华及中国杜威派兴盛时期里,中国的大众教育、普及教育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仅普及教育一项,1928年的小学生数就比1912年超过600万^{[20]360},这在当时衰败的中国是一项大的进步。

在现代学制、教科书改革等方面,中国杜威派学人发挥了重要作用。1922年,我国颁布“壬戌学制”,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学制。新学制制定过程中,胡适、陶行知等中国杜威派学人及俞子夷、舒新城等深受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学者,纷纷对新学制发表意见。新学制的最后定稿,有关初等、高等教育的一些政策、规定则与胡适的努力分不开^{[21]484-485}。新学制确立后,新的教材改革也开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大型的“新学制”教科书,中华书局则推出了“新小学教科书”和“新中学教科书”。这些新教材强调社会生活的作用,与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一贯重视团体生活、儿童生活、重视社会需求的思想不谋而合,体现了杜威及中国杜威派学人的影响。

中国杜威派学人的实验精神开创了我国近现代教育实验的先河,最为典型的是陶行知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学校。这是杜威的一般教育理想和陶行知本人所发展的具体示范,对中国近现代师范教育和乡村初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教育杂志》几乎每期都会出现小学各类实验报告以及感想,实验这些教学的人中很多是南高师的学生或教师。他们具有的实验精神与郭秉文等在南高师重视教育实验、教学改革思想具有直接关系。

20世纪20年代可说是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影响的鼎盛时期,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推行三民主义党化教育,杜威教育学派的研究和实践有所冷落,但其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仍随处可见。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的支配下,官方开展了对杜威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哲学的批判运动。杜威的中国弟子中,不仅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适成为首当其冲的批判对象,就连陶行知这样政治上进步的民主人士,其教育思想也遭到否定。实际上,批判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由于杜威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反传统经院式教育的特色,不可避免地被利用于新中国历次的教育改革中。文革结束后,原属政治层面的一些“禁区”不复存在,拨乱反正中,教育界首先对陶行知等政治上进步的民主教育家重新予以高度肯定,但在研究中都尽量回避或淡化他们与杜威的关系,尤其是学术上的渊源和继承关系,更多的是强调思想和实践的创新、超越。到后

来，对杜威以及杜威学派教育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也进行了重新评价，包括胡适等人，也就无须一定要与杜威划清界限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将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等具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教育家，看作中国杜威派学人并进行研究。这一研究将为我们教育改革沟通中西、借鉴历史提供方法论及实践参考。

参考文献：

- [1] 胡适. 胡适全集(第4卷)[M]. 季羨林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2] 高平叔. 蔡元培哲学论著[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 [3] 周洪宇. 陶行知研究在海外[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 [4]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陶行知全集(第5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 [5] 吴俊升. 教育与文化论文选集[M]. 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
- [6] 蒋梦麟. 西潮·新潮[M]. 长沙:岳麓书社,2000.
- [7] 约翰·杜威. 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 姜文闵,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 [8] 约翰·杜威. 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M]. 赵祥麟,任钟印,吴志宏,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
- [9] 胡适. 胡适全集(第1卷)[M]. 季羨林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10] 曲士培. 蒋梦麟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
- [11] 梁吉生,杨珣. 爱国的教育家张伯苓[J]. 南开学报.1981(1):39.
- [12] 胡适. 胡适全集(第20卷)[M]. 季羨林主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13]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陶行知全集(第3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 [14]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陈鹤琴全集(第4卷)[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
- [15]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陶行知全集(第2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
- [16] 崔国良. 张伯苓教育论著选[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 [17] 格里德. 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M]. 鲁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 [18] 姜义华. 胡适学术文集·哲学与文化[M].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19] 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 陶行知全集(第1卷)[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
- [20] 吉尔伯特·罗兹曼. 中国的现代化[M].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 [21]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 胡适的日记下册[G]. 香港:中华书局,1985.

Dewey School in China and its Significance

WANG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In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 major event was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the Dewey School by scholars who studied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s of John Dewey, such as Guo Bingwen, Hu Shi, Tao Xingzhi, and Chiang Monlin (Jiang Menglin).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modern educational philosophy, explores the innovations and legacy, and brings to light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Dewey School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education.

Key words: dewey; dewey school; experimentalism education

[责任编辑:孟青]